

马可·波罗眼中的成都风情

萧易 叶牧天

卓有成就的旅行家

公元1275年，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穿过以色列、叙利亚、伊朗、阿富汗，翻过帕米尔高原来到中国，随行的还有父亲尼古拉与叔父马菲。学者们提到马可·波罗的贡献时，常常将马可·波罗誉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先驱，其实，这种说法并不确切。

中国与欧洲的交通早于1219年便已开通，这一年，成吉思汗西征花刺子模（里海东边的一个国家），于是东到中国，西抵欧洲，交通畅行无阻。十三世纪初到十四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间，中国与欧洲往来不绝，其中又数元代政治家耶律楚材为先驱，他随成吉思汗西征，在西域呆了9年，著有《西游录》；另一位来到西域的便是赫赫有名的道教祖师丘处机，法号长春道人，1221年，丘处机奉成吉思汗之召赴西域，经阿尔泰山，取道天山山麓，经伊犁、巴尔克到撒马尔干，于1223年东归。他的路途见闻，被后人收入《道藏》。

1277年，又有两位中国旅行家扫马、马可远赴欧洲。扫马经君士坦丁堡、拿波里，7月到罗马，9月至巴黎，10月在英国受到英王爱德华一世会见；欧洲人柏朗嘉宾、罗伯鲁、海屯、阿多理等人，也在此后长途跋涉来到了东方。

因此，将马可·波罗誉为东西方旅行家的先驱，显然有失偏颇。不过，在这些中外旅行家中，马可·波罗却无疑是名气最大的一位，并拥有着一段奇妙的经历，根据他自己的描述，他在元朝当过官，得到忽必烈赏识，担任使臣，出使四方，而更令他名声大噪的，则是一本《马可波罗行纪》。

万里桥上的商铺

至元二十四年（1287年）前后，受忽必烈派遣，马可·波罗由大都（今北京）出游，经阳曲（今陕西太原）、长安（今陕西西安），辗转来到成都，成都并不是行程的终点，他还由成都入云南，历罗罗斯（今四川西昌一带）、哈喇章城（大理）、至缅甸、老挝，行程大约6个月。

由元朝交通路线看来，从阳曲、长安到成都，沿途须经过勉县、广元、剑阁、梓潼、绵阳，及阳平关、朝天关、剑阁关等关隘，全程约600公里，其中，汉中至广元一段，是古称“金牛道”的傍山栈道，“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”的滋味，马可·波罗应深有体会。经过数月跋涉，马可·波罗来到成都，在《马可波罗行纪》第113章《成都府》一章中，记录了他对成都的印象。

在来成都之前，马可·波罗显然已听说了一些成都的历史、掌故，在《成都府》开头，他写道，“（成都）昔是强大都市，历载富强，国王多人为主者，垂二千年矣”，“此州昔有一王，死时遗三子，命在城中分地而治，各有一城。然三城皆在都会大城之内”。马可·波罗记载的这位国王已殊难考证，他笔下的成都城却已为后人证实。历史上，唐代高骈曾在成都修筑过一座“罗城”，有学者认为，马可·波罗说的“都会大城”，应该就是“罗城”，而城中的“三城”，则是“大城”、“南少城”与“北少城”，三座城既相互独立，又包含在“罗城”之中。

马可·波罗喜好游历，阅历颇广，成都城的壮观还是令他大为感叹，在他眼里，成都是一座壮丽的大城，许多大小河川发源于远方的高山，从不同方向围绕、穿过成都，其中最著名的，莫过于锦江，马可·波罗称之为“江水”。在《马可波罗行纪》中，他写道，“有一大川，经此大城。川中多鱼，川流甚急，广半里，长延至于海洋，其距离有八十日或百日程”，“此川之宽，不类河流，竟似一海”，锦江船舶众多，商贾乘船“往来上下游”，打鱼的渔船拉网捕鱼，“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盛者”，以致马可·波罗不得不声明：“未闻未见者，必不信其有之也”。历史上的锦

江是成都的动脉，不但哺育着成都人，还是一条繁华的水道，而元代成都则是河运的黄金时代，百舸争流，千舟竞帆，汇聚成了锦江的财富海洋。

锦江上有一石桥，桥“宽八布，长半里”，两边有大理石柱，一木制桥顶贯穿桥上，颜色鲜明，气势恢弘，与马可·波罗在苏州见到的小桥截然不同，这座桥还是一个繁华的集市，桥上一字排开许多木制房屋，都是商贾、工匠经商的商肆，能“朝构夕折”；桥上还能看到元朝统治者的征税之所，税金“每日不下精金千量”。这座桥，后人考证为万里桥。

从《马可波罗行纪》看来，马可·波罗对成都的记载，仅仅限于万里桥与锦江一带，并未对元代成都有一个具体介绍，以及描述成都百姓的风土人情，料想他也是走马观花，并未在成都过多停留。而根据元朝的官方史料，锦江是元代成都的重要河道，舟行不息，繁华无比，马可·波罗看到的应该只是成都的最繁华的地方。

由于行程紧迫，马可·波罗匆匆告别成都，沿途碰到一些村落，当地居民除了耕作，还擅长纺织布匹与绫绸，绫绸精美无比，竟引得中亚、西亚商贾不远千里慕名前来购买，马可·波罗赞叹不已，他不知道，这种绫绸，便是举世闻名的蜀锦。

盛产珍珠的湖

马可·波罗由成都转道雅安，这一路山高路险，森林密布，村落大多已颓败，了无人烟，沿途狮、熊等猛兽出没无常，商贾经过这里皆如履薄冰，幸好路边生有一种大竹，每节长逾三掌，商贾行至此地，夜间伐竹点燃，竹燃烧有爆炸之声，声震方圆十里，猛兽才不敢靠近；而爆炸声太大，竟有人惊惶致死。

出成都后，马可·波罗来到建都州（今西昌一带）。建都州生活着不少彝族人，全州随处可见“竹编楼”与“石垒房”，遍地种植玉米、红薯，彝族人家的土围墙上，都盖着厚厚的松脂，房前屋后挂满了金黄色的玉米和红色的辣椒。马可·波罗在《行纪》中记载，建都州物产丰富，诸如狮、熊、狼、鹿、山猫、羚羊等山中野兽珍禽不计其数，马可·波罗形容这里“产麝之兽甚众，所以出产麝香甚多”；建都州附近有一个咸水湖，盛产珍珠，忽必烈不允许当地百姓开采，只有自己需要的时候才令人开采，建都州居民无人敢冒死前往。马可·波罗说的大湖，实际就是现在的邛海，而它也不是咸水湖，而是面积约 30 平方公里的淡水湖。邛海既产珍珠，又盛产鱼虾、菱角、海藻，沿岸居民多靠捕鱼为生。离开邛海后，马可·波罗进入今天的云南省，结束了短暂的四川之行。

对马可·波罗的疑问

《马可波罗行纪》记叙了马可·波罗在中国的经历，书却是在他的家乡意大利写成。1291 年，马可·波罗离开中国返回意大利，《马可波罗行纪》也在几年后撰写而成。《行纪》将一个靠马匹和剽悍游牧民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带给了欧洲人，巨大的经济规模、富饶的物产、战无不胜的骑兵、商业化的城市令欧洲人艳羡不已。然而，《行纪》中近乎天方夜谭的地理、方物、史事显然已超出了欧洲人的想象，加上马可·波罗喜好自夸，中世纪的马可·波罗名声虽然很大，却被认为是一个爱撒谎的人。一时间，欧洲人甚至用“这简直是马可·波罗”比作骗局。

欧洲人的怀疑并非完全的空穴来风，历史学家证实，《马可波罗行纪》并非一部完全真实的游记。由于文化差异，甚至是故意夸大，马可·波罗在《苏州城》一章中，说苏州的桥梁有 6000 座之巨，又言苏州人口极多，足可以征服世界；在《扬州城》一章中，又说他曾在扬州做过 3 年地方官，然而，扬州地方志并没有记载过有一位外国人马可·波罗做过扬州地方官，这或许只是马可·波罗的一次自我标榜。他所谓的使臣身份，经历史学家证实也不过是个办事员而已，与元代著名使臣刘秉忠、许衡根本无法相提并论。

最让历史学家感到离奇的是《行纪》里的“襄阳献炮”，马可·波罗说他们一家在元朝进攻南宋襄阳时曾献新炮法，一举攻陷该城。不过，这却是一个明显的谎言，马可·波罗一家到达中国已是 1275 年，而早在 1273 年襄阳便为元军攻陷，《元史》关于参加此役将帅的记载与马可·波罗的描述也迥然不同。显然，马可·波罗想把攻克襄阳之功冒为己有。

同样，《马可波罗行纪》中繁华的成都也可能不是马可·波罗看到的全部。宋末元初，蒙哥带着节节胜利的喜悦，把视线从中原移向四川，制定了“先取全蜀”，尔后顺江而下，消灭偏隅江南的南宋王朝，统一全国的战略部署。然而，这支纵横亚欧、所向披靡的劲旅，却遭到了四川军民长达 52 年的顽强抵抗。元军 4 次攻入成都，大肆烧杀掳掠，成都人口锐减。据《元史·食货志》等史料记载，元初成都人口户数只及宋代的二十分之一，偌大的四川省上贡的皇粮只占全国 0.96%。时隔三十年，马可·波罗来到成都，此时他看到的成都，是一座已经异常繁华的大都市？还是一个正在逐步恢复经济繁荣的城市？